

揭秘

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核大战乌云笼罩中国上空时的往事揭秘。

1969年3月至8月,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衣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寿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开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因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交;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21日,陈毅离京。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在三四月间返京。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回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摘自《党史博览》

科学面对疾病,良心面对患者

我国第一临床医院临床证明:知峰堂蜂胶降糖比较缓慢,但长期效果却会使血糖平衡,它内含有的300多种有益成分,形成强大的综合功效,对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效果最佳。就此,我国权威医学名著《中华本草》也证实了蜂胶的八大功效,可全面杜绝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

糖尿病不能治愈,这是目前医学上的共识,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的相对或绝对缺乏以及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引起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的综合症。随病程延长,可引起广泛的微血管和心血管病变,进而引起全身心、脑、肾、眼和肢端等病变。但就目前的医学技术而言,人类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所以,要尊重科学,长期治疗才能抵御糖尿病对人体带来的更大伤害。

许多治疗糖尿病的产品抓住了糖尿病人这样的心理:由于病症的长期折磨,总想找到根治的良方。于是大肆宣传糖尿病是可以治愈的。到头来,糖尿病患者得到的却是越来越重的疾病和因长期居住过高而带来的糟糕心情。

世界糖尿病协会在发表前年度报告中反复强调:治疗糖尿病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整个的治疗才能防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加剧。

知峰堂公司巨资引进气相、液相色谱仪,严把蜂胶提纯关,对成品进行成分核对。在消费者蜂胶产品真伪困惑时,特邀数千名消费者参观厂区,这是其他蜂胶厂所不敢做的见证活动。空气纯化高出国家标准的两倍。当时他们看到日产万金的流水线只有毛刷操作时,他们惊叹科技的先进。亲眼目睹气相、液相色谱仪对蜂胶原料及产品严格检测,他们欣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选择了高品质的知峰堂蜂胶。

知峰堂蜂胶不仅有中医药典《中华本草》中所列举的活血通管、修复神经、防治感染、去腐生肌、抗氧化、无毒性等八大功效作用后,更以其含有二十多种、三百多种生物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的实力,经八年验证让一切卓越的综合素质:

知峰堂一再告诫糖尿病患者:治疗糖尿病一定要先保护血管、神经、代谢系统,治疗的关键更在于预防和治理并发症。

事实证明:糖尿病人如果光降糖,不注意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就会接踵而来:

郑州专一 河医一附院立交桥东20米路北知峰堂
新乡 五五广场西100米电业局斜对而知峰堂
郑州专二 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西60米路南知峰堂
新乡 洺水街清水大药房/登封 高山广场十全堂
郑州 市医院向西200米保和堂药店,宋陵药店
上街 人民医院对面发信街向北20米路东知峰堂

咨询电话: 0371-66974217 65959732

欲了解更多健康生活,请关注郑州商都频道每天11:10《知峰堂·缤纷生活》健康栏目。